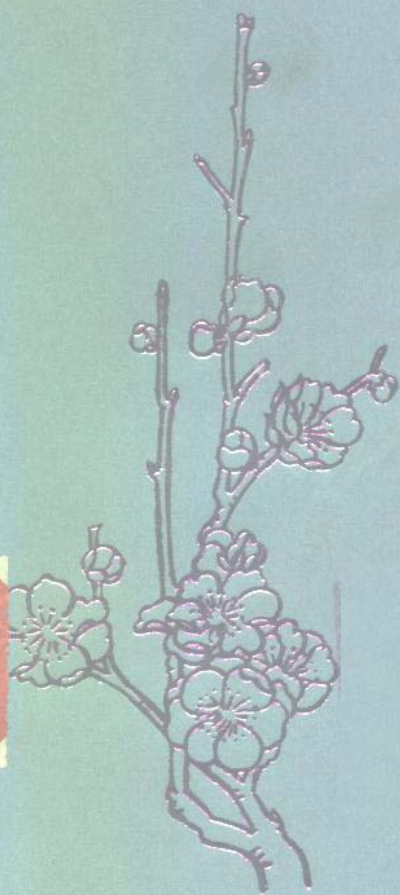


王船山學案

陆复初编著



王船山學案

陆 复 初 编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王 船 山 学 案

陆复初 编著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6.5印张 6 插页 41.2万字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 500

ISBN 7—216—00045—5/B·7

统一书号：2106·100 定价：3.60元

序

萧楚父

一九八一年深秋，全国宋明理学讨论会举行于杭州，会后，我怀着“望迷西子湖边路，梦绕漓江水上升”的心情，又赴广西参加比较哲学讨论会，有幸与陆复初同志相视一笑于桂林。是时，复初同志已纂成《王船山学案》初稿，会中即惠示全书纲目及长篇导言。旋返汉皋，又奉其自昆明寄来的刻印全稿五巨册，捧读之余，启迪实多，管窥所及，或有异解，而笃信船山“异者所以贞同”的观点，乐与辩难切磋，故书信往来不绝。一九八二年九月，复初同志被邀来汉上，参加湖北省纪念王船山逝世二百九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他先寄来有独得之见的论文，《江汉论坛》乐予发表；在会上他出自肺腑的诚挚发言，使与会同志为之动容。我们之间，以研究船山学为纽带，建立了船山所谓“我识古人心，相将在一林”的友情。

陆复初同志投身革命很早，解放初由北平随军南下，驻马滇池，正待以笔代剑、献酬抒才，而竟于解放后受到党内左倾路线长期诬害，历尽坎坷。他身处逆境，却从未消沉，对党的事业始终怀着坚定信念，并以坚强的毅力从事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史的研究，托心毫素，尚友古人。他选择了博学深思、著作宏富的早期启蒙学者王夫之作为研究重点，积二十余年之不懈努力，终于纂写成数十万言的《王船山学案》书稿，勒为上、下两篇，纲目并

然；继又多方征求意见，斟酌损益，反复琢磨而成此定稿。其用力之勤，致思之广，辨析之精微，寄意之遥深，实如船山所期：“善读书者，绎其言而展转反侧以绎之，道乃尽”；而非一般浅尝辄止、“浮以求明”者所能望其肩背。

荀卿有言：“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陆复初同志读船山书，治船山学，择善固执，拳拳服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学风，鄙薄“入乎耳、出乎口”的“禽犊”之学。船山基于一种民族的自信，改铸庄子“参万岁而一成纯”一语，认定“数千年以内，见闻可及者，天运之变，物理之不齐，升降污隆治乱之数，质文风尚之殊，自当参其变而知其常，以立一成纯之局而酌所以自处者，历乎无穷之险阻而皆不丧其所依，则不为世所颠倒而可与立矣”。他以此自警，持其志，充其量，亭亭鼎鼎，确乎不可拔。复初同志基于革命的自觉，以一种特有的历史感，汲取船山“出入于险阻而自靖”、“推故而别致其新”的立身治学精神，用以自勉自淬，虽遭厄厄而自强不息，始终保持“寒梅春在野塘边”的乐观心态，寄希望于人民和历史的未来。因此，他特别重视船山的史论。船山为总结明亡教训、“推本得失之原”而读史、论史，把历史看作是人们能动取鉴的一面镜子，认为“善取资者，变通以成乎可久”，“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已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并指出，借鉴历史是“设身易地以求其实”的能动的思维过程，“鉴之也明，通之也广，资之也深”，可以做到“人自取之，而治身治世肆应而不穷”。陆复初同志执斧伐柯，善于借鉴船山的史鉴之法，为严肃反思数十年来革命道路曲折的教训、追溯其根源而引古筹今，读古人书，研思想史，纂著《王船山学案》等，都决非嗜古好奇，为史而史，而是贯注了一种对革命理想的忠贞，为探求真理而上下求索的历史热忱。我认为，这是

陆复初同志这部著作中涵蕴着的最宝贵的东西。

船山学术，体大思精，他以“诚知得罪于先儒”的自觉批判精神，别开生面地注经、衍子、评史、论政，勇于正视社会现实矛盾，乐于吸取新兴质测之学，善于熔铸大量先行思想资料，因而能够创立具有历史总结意义的博大体系。对于这一博大体系真正展开探究，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此前，虽有刘献廷、潘宗洛、缪沅等就亲访见闻作过一些表彰之词，但在十八世纪历史涸流及文字狱高潮中，船山故居曾被查抄，船山书稿无关宏旨者被四库收录六种而查禁毁板者达九种，自然谈不上对其思想的阐扬。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伴随着中华民族在深重苦难中的觉醒，船山遗书应时刊布，流播日广，船山思想乃被广泛重视，或挹其精华，或取其糟粕，谭嗣同、杨昌济等剥石以取玉，曾国藩及何键之流买椟而还珠，同声褒扬，而用心各异；晚清以来的论者，或“誉”之为“本朱子而黜异说”的“一代儒宗”；或“贬”之为“好奇兼爱”的“杂家之流”；高下随心，漫无定论。“五四”运动唤醒的民主和科学的启蒙主义意识，大大地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比照，促进了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启蒙先驱的发掘和反思，使船山思想研究进展到新阶段，不少学者力求清理船山学术体系并把握其理论重心。如李石岑首标其哲学基础为“体用一源论”（见《中国哲学十讲》）；王孝鱼乃目其根本观念为“天下惟器论”（见《船山学谱》）；嵇文甫把船山哲学概举为“天人合一，理势合一，常变合一”之学（见《船山哲学》）；张西堂则总称其世界观为“道器相须、理气一元、心物一元”之论（见《王船山学谱》）；吕振羽就其社会政治思想直命之为“经济欲望论”（见《中国政治思想史》）；熊十力就其学说的宗旨而纲举为“明有、尊生、主动、率性”四原则（见《读经示要》）；唐君毅就其哲学致思进程由“继天道”、“立人道”而归宗于“人文成化论”（见《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侯外庐肯定其“具有近代新世界观萌芽”，更从自然史哲学的“絪縕生化论”、人性论中的“理欲合性

说”和认识论中的“继善成性论”诸环节展示其思想结构和范畴体系(见《船山学案》);许冠三又试图以“两端而一致”的辩证致知逻辑和“继善成性”、“因天造命”的历史人学说来括举其“具有人文主义色彩”的思想精华(见《王船山的致知论》、《王船山的历史学说》等组文)。凡此种种,皆持论有据,言之成理,见仁见智,各有会心。这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历史遗产的研究、诠释与评价的尺度,同研究者的历史实践水平及其所采取的视角与方法密切相关,总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并表现为“新故相资而新其故”,不断地扬弃旧的局限、开拓新的领域。陆复初同志处于新的历史转折时期,在上述诸家之后来续纂《王船山学案》,自有一番甘苦。虽然“学成于聚”,有“先我而得者已竭其思”的丰富成果可资借鉴和继承;但必须不囿成说,“谢故以生新”,才能反映“道莫盛于趋时”的时代精神。新纂《学案》,注意及此。首先,通读船山全部著作的基础上编选原著资料,阐微钩沉,搜罗颇富,不仅对其哲学思想诸层面广为采辑,且于人们所忽视的社会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民族思想、军事思想和文艺思想也多方发掘。其次,编选的纲目自成体系,每一主题下所加编者按语及一些重要段落的注释、评析,表明作者之用心,往往驰骋古今、吞吐各家,而时出新意。至于全书首列之《导言》,不仅论及船山“奋斗的一生”及其学术发展的三阶段;而且为说明船山思想的来源及其特殊贡献,追溯到整个中国历史和文化发展的特点;并就船山思想的要点,作出了新的概括。言简而意赅,凝聚了作者多年研究的心得,与前代和旁世诸家所论,有所同,更有所异,卓立不苟,自成一家之言。

半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的船山学研究已取得不小的进展。其间虽经十年浩劫中被挫折禁锢,但如陆复初同志等之潜心砭砭,锲而不舍,正是明夷之象,火传不尽。如果说一九六二到一九八二年两次全国性的讨论,显示出船山学的研究大有进展,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前进螺旋;近几年出现的关于船山思想

的基本性质和总体评价上的歧解和争鸣，更显示了船山学的研究在继续深入，并有可能形成对峙的学派。这是极为可喜的事。三、四十年代，正当我国历史和文化发展都处于“贞下起元”的氤氲时期，船山学研究领域曾涌现过一批各具特色的专著，其中以辑选原著资料为形式的综述船山思想的“学谱”即不只一种，各有弋获，故互有短长。八十年代的中国，经过拨乱反正而迎来改革、腾飞的新时期，伴随整个学术的欣欣向荣，以一九八二年纪念性学术讨论为契机，又涌现出一批船山学研究的新论著。这批论著，或单行，或辑为“研究丛书”，南北呼应，日益增多，并表现出某些新的特点：论述上不止于宏观泛论，而是力求具体剖析，分题定向（诸如“认识论范畴”、“辩证法体系”等），着意向专精深细方面发展，如船山所云：“浚而求之，是以有论”。资料占有上力求系统全面，一般立论有据，引证详博，而以通读卷帙浩繁的《船山遗书》、分类编选原始资料为基础，再综论其思想的著述已有数种，陆复初同志此书即其中较淹博的一种，盖如船山所云：“博而证之，是以有论”。在这样的研究基础上所产生的学术争论，当然超出了某些文字训解、史实考订之类的枝节分歧，而具有黄宗羲所谓“宁凿五丁之间道，不假邯郸之野马，故其途亦不得不殊”的性质，因而有可能形成船山学研究中的不同派别。这是船山学研究领域的新气象、新进展，值得额手称庆。中外历史反复证明，学术的繁荣，真理的发展，人们对任何复杂对象的本质认识的深化，除了社会实践的条件以外，主要依赖于该学术研究领域内形成真正的学派，展开正常的争鸣。真理是一个过程。学术真理往往是在各种“独得之见”、“相反之论”的多元化发展和互相辩难争鸣中展现的。因而，志在求真的学术研究，一定要勇于坚持“独得之见”，乐于听取“相反之论”，尊重真理发展的辩证法并善于在对立的两极保持必要的张力。船山学研究经过多年来许多人的持续努力，确已取得不小成绩，打下较好的基础，新校点的《王船山全书》即将问世，

陆续出版的《船山学报》、《王船山研究丛书》流誉学林，当前更出现了并立诸家互相争鸣的大好局面。陆复初同志此书的出版，在并立诸家中又增加一家，必将促进这一大好形势的发展。既然择善固执，自立一家，就有一个船山所谓“心之用患其不一，一之用又患其执”的问题。关于这个“治心之法”的问题，船山作了不少分析而有其结论：“君子格物而达变，而后可以择善而执中，贞夫一者所以异于执一也”。“贞于一而通于万，则学问思辨皆逢其源，非稍有得而自恃以止也”。既然面对争鸣中的相反之论，就有一个船山所谓“惊于相反”或“乐观其反”的问题，船山更明确主张：“听道之运行不滞者以各极其致，而不忧其终相背而不相通。是以君子乐观其反也”。我想，这些观点和这种心态，是可取的。质诸复初同志，不知以为然否？

陆复初同志这本新著，虽经一些周折，终于在湖北人民出版社的毅然支持下得以出版。征序于予，能不从命？谨就所窥，略序其发愤著作、述往思来之意而已。

一九八六年五月稿于珞珈山麓

目 录

绪 论	1
一 王船山奋斗的一生及其划时代的学术成就	1
二 王船山思想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18

上篇 船山的哲学思想

第一章 宇宙观	35
〔说明〕	35
一 世界的物质性	47
二 物质和意识的关系	60
三 世界的普遍联系及主体与外部的普遍联系	69
第二章 认识论	86
〔说明〕	86
一 生命——认识的起点	101
二 实践	111
三 认识	117
四 认识主体的修养	127
五 真理	149
六 人生	166
第三章 辩证法	181

〔说明〕	181
一 联系和发展	191
二 量变和质变	194
三 矛盾	210
四 抛弃形式, 改造内容	241

下篇 船山的社会历史思想

第一章 社会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	251
〔说明〕	251
一 形势比人强, 比理强	264
二 共同经济欲望决定历史	272
三 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	276
四 三代存在原始民主残余	277
五 废封建、置郡县是历史的必然	285
六 对封建制度的批判	288
七 社会必然日趋文明、日趋大同	310
八 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	312
九 促进商品货币流通, 活跃民间经济生活	320
十 从经学到理学的流弊及其批判	334
十一 美学、文学大纲	346
第二章 群众活动、农民起义和民族关系	353
〔说明〕	353
一 群众活动	362
二 农民起义	377
三 民族关系	389
第三章 国家职能学说	399
〔说明〕	399

一	决策——多方面情况的掌握与意见的倾听	405
二	改革必须因人因时	425
三	维持政治稳定，切禁大张大弛	441
四	培养和造就一代人材	453
五	战略上独立自主	464
六	军事部署上的积极防御	472
第四章 现实生活与启蒙思想的特色		483
	〔说明〕	483
一	对永历王朝	495
二	对大顺军、大西军余部	499
三	对“三藩之乱”	509
四	走自己的路	512
五	对未来的希望	516

绪 论

一、王船山奋斗的一生及其划时代的学术成就

王夫之(公元1619——1692年)，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晚年居衡阳曲兰的石船山，筑“湘西草堂”从事著述，故又自号船山，学者称为船山先生。

船山于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生于湖南衡州府(今衡阳市)城南王衙坪。

他的祖先是世袭衡州卫指挥，系从江苏高邮到衡阳当武官留居此地的。他的家道在祖父王惟敬时中落，他父亲兄弟二人，父亲名王朝聘，叔父名王廷聘，都是秀才。这时他家已是“薄田仅给膾粥”，生活十分困难，“家徒壁立”，是比较萧条的了。王朝聘有三个儿子，长介之，次参之，三夫之，夫之小名三三。只有船山学术成就卓著，成为我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之一，与顾亭林、黄黎洲并列为明清之际中国启蒙三大师。顾亭林比王船山大六岁，江苏昆山人，黄黎洲比他大九岁，浙江余姚人。王夫之和顾、黄二人都没有见过面，也许还互不相知，他们的思想基本上是殊途同归，不谋而合的。同类型的思想家中只有比他大八岁的方以智，和他有较深的友谊。

王船山出生的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天崩地解”(黄宗羲语)的时代。不仅从中国，而且从全世界来看，十六、十七世纪都是

一个大的变革时代。这个时代是中国从世界前列的地位一落千丈的时代。中国四大发明——指南针、造纸法、印刷术、火药传入西方，成为“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前提”（马克思），四大发明给了西方的社会变革以巨大的推动力量，而在四大发明的故乡——中国，却未因这些发明出现新的突破。先进的中国从这个时候起，开始落后于西方。在十六、七世纪的中国封建社会中，由于地主经济的制约，加上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发展不平衡等因素，使发生得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不断中断、夭折，走着一条“死的拖住活的”的经济发展的曲折道路。上层建筑领域，政潮起伏，波谲云诡，而矛盾、斗争的焦点，又无不直接、间接影响着经济的发展。围绕着经济发展，或主张改革，或主张保守，或者奋发图强，或者安于现状，开展着派系之间的争论与反复的排挤倾压，蔚为奇观。到了万历年间，全国各大城市发生了市民暴动。形成了东林党人争取言论自由和集会结社自由的抗议运动。但是不仅市民暴动遭受到残酷镇压而失败，东林党人的抗议，也因大宦官魏忠贤的镇压而饱受摧残。到天启、崇祯之际，起自陕北的农民军逐渐形成了大起义的高潮，关外的以满族贵族为首的势力也一旦崛起，迄于明亡，形成了三种势力的角逐。十八世纪，清朝统一了全中国，政权走向稳定，但这时早已落后于西方一个多世纪，而封建地主经济的再度重建，又使中国继续落后了二百多年。但是就在这落后的三百年中，由于文化的发展往往有着自己的规律，对经济和政治保持相对的独立性，而且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素居世界先进之列，中国的学术界又保持了对历史遗产的继承性，丰富的先行材料经过长期的积累，到明清之际出现了伟大的启蒙思想家群体，是中国历史上光辉的一页，我们不可因明清时代中国政治、经济的落后，而忽略了当时文化、学术上的成就。

1. 少年时代

船山的儿童时期，中国的大地，震荡不安。就在他出生的前后数年，明神宗朱翊钧死，其子朱常洛即位不到一年又死。在这期间发生“挺击”、“红丸”、“移宫”三大案，反映了明王朝的日趋腐朽，而兴起于黑山白水之间的满族贵族杰出首领努尔哈赤就在船山出生的1619年，于辽阳附近，打败了明总督杨镐的四十七万大军，乘胜夺取了开原、铁岭，两三年后直取了明军重要据点广宁（今辽宁锦县）。

王船山四岁开蒙，由其长兄介之教读，七岁时（1625年，明天启五年）已读完了《十三经》，王船山的父亲王朝聘，在船山三岁时，由于考举人仅中副榜，想在仕途找个出路，入北京国子监学习五年，到船山八岁时，已五十八岁，以不愿行贿，罢选回家。过了两年，船山十岁，其父亲授以五经经义，为应科举作准备。十二岁时（1630年，明崇祯三年），船山开始结交朋友，作文字的交流。十四岁时（1632、明崇祯五年）中秀才，湖广学正王志坚荐入衡阳州学，每考均得第一名。十五岁时（1633年，明崇祯六年），船山兄弟三人同赴武昌考举人，均未中。十六岁时（1634年，明崇祯七年），开始从叔父王廷聘学诗，两年内读古今诗十万余首，参加衡州府岁试，列一等一名。十八岁时（1636，明崇祯九年）同两兄再次赴武昌考举人，仍均未中。十九岁从叔父王廷聘读史，这一年娶同邑陶万梧处士之女为妻。

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世局变化很大。当船山读完《十三经》的七岁那年，大宦官魏忠贤秉政，打击东林党，下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入狱。八岁时，阉党听信苏杭织造太监李实的诬告，逮捕应天巡抚周起元、吏部主事周顺昌、左都御史高攀龙、谕德缪昌期、御史李应升、周宗建、黄尊素，激起了苏州市民暴动。市民领袖颜佩韦、马杰、沈扬、杨念如、周文元慷慨就义。苏州

人民合葬于虎丘旁，题曰：“五人之墓”。恰在这年，后金努尔哈赤死，皇太极即位，第二年明熹宗朱由校死，其弟朱由检即位（即明末代皇帝崇祯），处理了阉党，魏忠贤自缢死。但国事并未好转。船山十二岁那年，陕西农民起义转入高潮，起义队伍众多，其中以王佳胤部为最强。张献忠聚众延安，据十八寨，称八大王。李定国年十岁，参加了起义。明军重点向陕西农民军进攻，但起义军大部入晋，成为在秦、在晋两大势力。王佳胤在晋牺牲，王自用（紫金梁）被推为首领，联合高迎祥、张献忠等三十六营，众二十万，高迎祥的外甥李自成与姪李过也从陕西到了山西，向东活动，在河北大名受到明将卢象升的阻击，转向河南，1635（明崇祯八年），十三家军会师于荥阳，李自成提出“分兵定向”的战略方针，经此次会议，起义军由分散游击转向联合作战。

李自成继续入陕活动，张献忠等则南下襄阳，进攻安庆，连营百里，先锋抵淮扬一带。未再东进，折回湖广，形势不利，伪降于明，积蓄力量后反谷城，转战四川。不久，高迎祥牺牲，众推李自成为闯王，声势益震。与此同时，后金在关外巩固其统治势力，并改国号为清。从鄂霍次克海到贝加尔湖，包括外兴安岭以南和库页岛的原属明版图，现均纳入清政权统治下，完成了统一东北的事业。崇祯皇帝朱由检猜忌成性，自毁长城，冤杀名将袁崇焕。先后任用周延儒、温体仁为大学士，开展派系斗争，置国事于不顾。

1638年（明崇祯十一年），二十岁的王船山开始与友人为文酒之会，赴长沙岳麓书院读书，并与邝鹏生等组织“行社”。1639年（明崇祯十二年），王船山二十一岁，三次与二兄赴武昌考举人，未中，与管嗣裘、郭凤趯、文之勇等组织“匡社”。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王船山二十四岁，弟兄三人四次赴武昌考举人，他与长兄介之均考中。船山以《春秋》一门优秀，得中第五名，学政高世泰、考官欧阳霖、章旷均很器重他。在武昌期间，他还参加了熊渭公等在黄鹤楼召集的“须盟”诗会。

当王船山十多岁参加一系列群众性的集会结社时，继东林之后，太仓张溥及其弟张采二人在家乡成立了“复社”，该社以“重气节、轻生死、严操守、辨是非”为宗旨，1628年（明崇祯元年），在尹山召开大会，1630年（明崇祯三年），复社举行金陵大会，1632年（明崇祯五年），又举行虎丘大会，知名之士云集于此，影响深远，声动朝野。顾亭林、黄黎洲、方以智均先后参加了“复社”的组织。王船山热心于群众性活动，很明显是受东林、“复社”的影响。

在王船山考中举人的前二年，李自成已在河南提出“均田免赋”的口号，每到一处，打开官仓，赈济饥民。起义军纪律严明，平买平卖，深受广大饥民的拥护，迅速发展数十万人，攻克洛阳，围困开封，歼灭明兵部尚书、陕西总督傅宗龙及保定总督杨文岳的联军，张献忠乘李自成围汴，吸引了明军主力，乘虚下濠州，入英霍山中。王船山中举后，与兄介之准备同赴北京参加会试，由于安徽、湖广交通要道均为起义军切断，道路受阻，1643年春，从南昌返回衡阳。这一年船山年二十五岁。

船山回乡后，自刻第一部作品《澹濤园集》，不久即为战火所毁。1643年（明崇祯十六年），李自成渡汉江，以荆襄为根本，称新顺王，建立政权。重申军令，不得藏白金，过城邑不得室处。妻子外不得携带妇人，宿营时只准用单布幕，战斗间隙，即出校骑射，夜四鼓，蓐食以听令，令行禁止，军声严肃。同时张献忠下武昌，称西王，置官职，题诗黄鹤楼，开科取士，下令没收楚王府金银财宝赈济贫民，这时十三家七十二营诸部诸首领，降死殆尽，只李自成、张献忠二部强大。李自成劝张献忠勿相火并，张献忠遂南下，连克岳州、长沙、衡州、宝庆、常德。

当张献忠南下派其义子艾能奇进驻衡州时，曾招请王介之、夫之及管嗣襄入幕。船山逃匿南岳山后，起义军遵得其父王朝聘，以召介之、夫之为释放条件，船山故意割破面皮及手腕，雇人抬去，其父得释，不久船山也设计逃走。作《七砺》诗。